

Jiaoyu Zhexue Lunkao

教育哲学论稿



余家菊 著
余子侠 编校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教育行政學



第一版

纪念余家菊教授一二〇岁冥诞

Jiaoyu Zhexue Lungao



教育哲学论稿



余家菊 著
余子侠 编校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哲学论稿/余家菊著,余子侠编校.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7-5622-3795-2

I. 教… II. 余… III. 教育哲学—研究 IV. G4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2375 号

教育哲学论稿

余家菊◎ 著

责任编辑:夏兴通

责任校对:罗 艺

封面设计:甘 英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707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 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250 千字

插页:2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5

版次: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定价:35.00 元

请
仲何回十仙下週 星四上午午自

教育哲学

第二章 教育之向上性

君子有三樂由玉天下不此焉。父母俱存兄弟無然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故君子有三樂由玉天下不此焉。一盡說

統緒披以不則個之徑倫得幾大之用一世之太平可觀此其可樂宜莫與
強矣而古人謂其可樂者事小於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果教育之價
值高於政治乎抑否之本質原不可同日而語乎情試思之

教育者人類文明所賴以維繫者也。政治者人類文明所賴以維持者也。
一則功在當時則澤垂後世無世也多時之業固如轉眼倏忽於當時而後

世澤亦差得而傳之向者之社會時限儘有有久有之跡而兩者價值之大
小則難有上下之分政權之與不與教育者以政治特質為強者其志為
支配教育特質為受教者其志為感化一存於人主者為獨治之主一存於
民者為公僕人之者唯之謂之民主惟民主者親故心誠意建拒喻能理者必悅而民悅
版表裏如一而天下無不統之弊而民無不化之德也故曰善治莫過於此

教育者其志為受教者其志為感化一存於人主者為獨治之主一存於民者為公僕人之者
惟民主者親故心誠意建拒喻能理者必悅而民悅版表裏如一而天下無不統之弊而民無不化之德也故曰善治莫過於此
教育者其志為受教者其志為感化一存於人主者為獨治之主一存於民者為公僕人之者
惟民主者親故心誠意建拒喻能理者必悅而民悅版表裏如一而天下無不統之弊而民無不化之德也故曰善治莫過於此

前 言

本书所辑系余家菊先生有关教育哲学方面的系列文字。

余家菊（1898.5.9—1976.5.12），字景陶，又字子渊，湖北黄陂（今武汉市黄陂区）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平生在求学、从教、参政的过程中，勤于思考，坚持写作，著述甚丰，约千万言，其中有关教育方面的论述计达数百万字之多。这些论著论文颇能结合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实际，尤其能针对近现代中国文化教育的现实问题，提出一些颇有独创性的见解。

长期以来，对余家菊的留世文字以及由这些文字包蕴着的思想认识，尤其有关中国文化教育的理论主张，人们颇有忽视。所幸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其哲嗣余传韬先生等人多年辛勤搜寻下，终于将其留存的著述文字收罗大半，并借以结集七辑，交由台北慧炬出版社先后出版。即便如此，于其早年在大陆时期的论作仍多有遗漏。为此，传韬先生不顾年届八旬的高龄，仍往返于海峡两岸，力求其尊翁早年成形的论作尽能重新成册传世，启迪后人。

时值其尊翁冥诞一百一十周年暨逝世三十二周年之际，今岁夏初间（五月九日至十二日），传韬先生再度返汉并抽身前来华中师范大学面晤其挚友吾师章开沅先生，将其尊翁当年抗战期间在中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亦余家菊先生的母校）为本科学生讲授“教育哲学”课程的讲义手稿，交托章师并请为之撰写序言。是时，两位老先生商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将该书稿付梓面世，社长范军先生当即应允。考虑到《教育哲学》系一大纲式课程讲义，内容精深但篇幅单薄，且传韬老先生年事已高，频繁往来海峡多有不便，故而两位师长嘱托我抽集余家菊先生于教育哲学方面其他文字辑为一册，并完成其校核工作。

欣然领命后，我即搜求余家菊先生早年于求学、从教期间所撰有关论文教

篇，随后传韬先生亦从台北慧炬出版社于新世纪初年结集出版的《中华文化要义（一）》中撷取若干篇幅转寄与我。由是现已结集的《教育哲学论稿》一书，实为余家菊先生在不同时期撰述的三部分文字组成：一是于1942年秋季学期为中华大学讲授“教育哲学”课程的讲义稿；二是早年在大陆时期先后公开发表的几篇有关教育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三是迁台后因眼疾不能执笔而口述由他人记录并公开发表过的论作。除此而外，结集时还收入了章开沅教授、梁尚勇教授、魏萼教授三人分别撰作的序言，以及余传韬先生所撰写的后记。尽管本书所辑文字，既有教育哲学方面的内容，又有中西文化研究的成分，但考虑到本书选编的主旨，且关于文化研究的文字从广义上讲亦可归属于教育哲学范畴之中，因此，遵从著者后人的意愿，我们以“教育哲学论稿”而名之。其中某些主题游离教育哲学较远的政治性言论，我们则稍作删削。

为了阅读的方便，本书编辑出版时一律将繁体字改为今日的简体字，并且采用横排版，文末出现的记叙时间于1949年以后全部改用公历日期，此前则保留民国纪年。除此而外，另申明数点，以替编辑凡例：一是繁体字一律改为简体字之时，异体字一般亦改为通用字（如“牠”改为“它”、“底”改为“的”、“祇”改为“只”、“作（事）”改为“做”、“藉（用）”改为“借”、“沈（没）”改为“沉”、“决（择）”改为“抉”、“甚（么）”改为“什”、“著（装）”改为“着”，等等），并采用现行标点符号；二是文中翻译名称，包括人名、地名、著作名、报刊名、组织机构名等，均保持原貌，且一般不加注说明；三是采用横排版后，原文竖排时涉及版式的方位词如“左”、“次”改为“下”，“右”则改为“上”；四是原文作者页末所注，改置篇末，编者所加注释以及有关篇目需加题解时，均置于页脚，篇末一般注明该文出处；五是原文中缺、漏的字（词）在补添时加附（ ）号以示，原文中多、衍的字（词）在删除时加附（ ）号以示，原文中错、别的字（词）在改正时加附[]以示，文中删削的文字则代以“……”。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今日人们行文区别分明的“的”“地”之字，作者于此二者则不加区分，考虑到时代（或地域）的原因，故一律保持原作而不作更改。

余子侠于戊子年小暑

章 序

这些年，国内教育界侈言“创新”者日多，但一般都属人云亦云，并非真正理解创新真谛并且实实在在创新。坦白地说，有些人无非是赶时髦，满足于空泛的话语创新。因此，我经常用“温故知新”一语与年轻同事共勉。此语出于《论语·为政》，原文是：“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故与古通，所以王充《论衡·谢短篇》对此曾有所发挥：“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温故知新，可以为师。”《汉书·成帝纪》也有类似解析：“儒林之官，四海渊源，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可惜现今许多从事乃至主管教育者却忘记了这句亘古而常新的古训，因而往往流于数典忘祖，在创新热潮中迷失了方向。

“温故知新”古训对于为人师者之特别重要，是教育的根本属性所决定的。我曾多次强调：“对于教育的发展通常不宜用‘日新月异’一语来表述，因为教育毕竟是一种塑造人的慢工细活。教育在任何时代都不能忽略前后传承与相对的稳定，因为教育本身具有人所共知的长期性与持续性的特点。教育必须适应社会的变迁，但是教育的发展又具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有其绵延千年、衔接古今的内在规律。当然，教育决不是孤立的存在，教育的发展与校园以外的各种社会因素紧密相牵连，教育的任何重大变革都是一桩繁密细致的系统工程，都需要经过多少次的实验与不断修正完善。因此，教育的革新在更多时间经常表现为渐进式的积累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水到渠成’。动辄以政治威权和‘群众运动’推行的粗暴‘教育革命’或所谓‘改革大举措’，不仅难以实现短期速成的预期目标，反而严重伤害了教育本身，特别是挫伤了众多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

即令是在武汉一地，与我持相同看法者亦大有人在。记得2004年9月20日，华中科技大学前校长朱九思教授，向该校现任领导及相关资深学者郑重推荐一篇评论文章，即刊载于《比较教育研究》杂志2003年第3期的《论大学的保守性——美国耶鲁大学的文化品格》（作者：王英杰）。这篇文章不仅介绍了耶鲁大学保守文化品格如何形成，还深入剖析了该校保守的管理、保守的教育理念，以及由此而引申的“大学保守文化品格的合理性”。文章的结语尤其令人感动，作者坦陈心曲：“当我们沉下白日躁动之心，秉烛夜读耶鲁大学的发展史时，我们就会被耶鲁清新的文化品位，深厚的文化积淀所打动：它几百年来不为躁动的社会变迁所动，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社会职责，如同人类社会漫漫路上的一盏明灯，星光闪烁，为世人所瞩目。它在静谧中发展，在稳定中前进，以其保守的文化品格营造出一所循序渐进的世界一流大学，创新型人才和重大科研新发现如清泉从中汨汨流出，永不干涸，永不浑浊。”

九思先生是我最为敬仰的教育界前辈之一，我们在教学理念方面相知甚深。所以，他在向华中科技大学领导推荐的同时，也将此文以及附函一并影印示我，其用意无非是促我思考，共矫时弊。正好去年夏季，牛津大学友人安排我与妻子前往享受学术休假，遂有闲暇对这所比耶鲁还要古老的大学从容进行一番考察。回国后在《同舟共进》杂志发表《泰晤士河源头的思考——从“牛津现象”谈起》一文，大概可以作为交给九思老师的作业。我认为：“牛津的特点是政治上偏于保守，文化上善于守旧。”“牛津就是这样悠然自得地经历了几百年的沧桑巨变，旧貌并未完全换新颜，却又不紧不慢地跟上时代的步伐。无论是人文还是科技，许多学科仍然处在世界前沿，人才与成果之盛有目共睹，遑论诺贝尔奖获得者之绵延。”我对牛津的评价也许有所溢美，但用意确实是强调教育创新必须有深层思考。现代与传统并非截然两分，创新与守旧本应相生共存，否则创新便必然会流于浅薄的时髦，甚至流于单纯的形式创新乃至话语创新。多年以来，如此这般的现象难道还少见吗？

我丝毫无意贬低这些年中国教育的迅猛发展，但是无可讳言，中国的教育改革正处于十字路口，在教育理念的深层存在着迷失方向的危险。对于这一严重缺失，已经有为数不多的现任高校领导坦诚表露过自己的忧心。也许是巧合，

在这样关键的时刻，传韬兄专程从台北来汉，将其尊翁遗留的讲义手稿《教育哲学》交我阅读，并商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期付梓问世。因此，更为促进了我对于教育改革必须温故知新的思考。

家菊先生是我校早期著名校友，因为他不仅是我校前身中华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而且还曾断断续续在中华任教多年。这部讲义就是他于1942年秋季，在重庆中华大学讲授“教育哲学”课程期间撰写供教学所用。全稿共5章，分别为“教育之向上性”、“思索”、“知止”、“人格之发育”、“人性论”，乃是教育哲学必须探讨的重大问题。由于是课堂讲义，必须突出重点，所以好像是若干专题的整合。但由于作者长期从事教育科学的教学与研究，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深厚的学理探究积累，而且此前已经出版过《教育原理》、《孔子教育学说》、《孟子教育学说》、《荀子教育学说》、《陆象山教育学说》等教育专著，早已形成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与理论框架。因此这部讲义乃是家菊先生教育学说的精华，取精用宏，画龙点睛，往往于细微处显精神，于平淡中发光华。1942年正是抗战进入最为艰苦的时期，重庆虽属后方，但已是物资匮乏，物价高涨，人民生活极为困苦。中华大学与其他西迁高校一样，房舍简陋，图书设备欠缺，虽教授亦未能免于贫寒。但是，即令在这样艰难的岁月，家菊先生依然殚精竭虑，刻苦经营，字斟句酌，一笔不苟地撰写出这部言简意赅的高水平讲义。虽然已是56年以后，作者辞世亦已32年，作为后辈的我们，目睹这部毛笔正楷写成的严整手稿，仍然可以想见当年前辈学者安贫乐教的高风亮节。

由于梁尚勇、魏萼两位先生在他们的“序”中都对这部讲义作了全面精辟的评析，所以我只就读后所感补充两点浅见。

一是作者的学术境界。

讲义第一章“教育之向上性”，一开始便引用了《孟子·尽心上》的那段名言：“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然后便提出极具启发性的问题：“统治世界，小之则个己之经纶得展，大之则一世之太平可期，此其乐宜莫与竞矣。然而古人谓其可乐之量小于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果教育之价值高于政治乎？抑二者之本质

原不可同日而语乎？请试思之。”

问题一经提出，学生想必立即启动积极思维。

老师把学生的思维引向“二者之本质”，开门见山就明确指出：“政治之特质为强力，其方法为支配；教育之特质为爱护，其方法为感化。”所以孟子说：“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上》）然后又进一步从正面申论：“教育事业发源于爱他之心”；“教育之特质为向上，以臻真善美圣之境”；“国家教育必具立国理想以伸人类向上之性”；“教育之可能，实由于人类之可塑性与向上性”；“向上之性必求发展”；“向上心之强弱，决定人生成功之大小”；“向上心之展示在立志、勤奋、有恒”。

家菊先生无意比较政治与教育两者价值之大小，以及两者地位之高下，其着眼点在于从特质、方法、功能诸方面把教育与政治区分开来。教育有自己的独立品格，教育不应成为政治的附庸，更不应与政治相混同。面对当时国民政府极力推行的党化教育，他在课堂上慷慨陈词：“自‘目的圣化手段’之说兴，企求崇高之目的者，每采取毒辣之手段以赴之。间谍学校，海盗海淫；党团训练，造谣嫁祸。教育之事，不尽以正义博爱为帜，益彰明矣。斯诚人生之大忧，而教育思想之难题。”他把这种党化教育称之为“恶性教育”，并且严正斥之曰：“吾人不以教育视之矣。”余生也晚，无缘亲聆先贤教诲，但我也曾是这种“恶性教育”的受害者。就在家菊先生发表这番宏论的次年（1943年）夏季，我被学校开除学籍，其原因正是由于反对党团的“造谣嫁祸”，把我视为“思想不纯”的叛逆分子。因此，我对家菊先生上述“正义博爱”的呼声，特别感受亲切。

坚信人类本有向上之性，“故教育为爱人之业，而其爱之法，则为使人向上”。此之谓大爱，这不仅是家菊先生的理论，而且是他终身服膺的信仰，于此可见其学术境界之不凡。

二是作者的学术品格。

讲义第二章集中讲解“思索”，首先从本质上认定“思索为人生之向上表现”，尤其强调“向上性强者勤于思索”。而在有关心物（即精神与物质）之思索方面，作者着重论其“渊源于人生之实际”，“亦有关于人生价值之观念”。作

者的理念是：“人生诚欲向上，其精神对于物质必须具有控制之力，或弃或取，或损或益，全由己意。即令于某种程度下，全由己意为不可能，最少限度，亦当勿使‘心为形役’。淡泊始能明志，乃必然之理也。”参悟人生，说理通达，对大学师生应当可以产生很大感染力。例举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所贵不在饮食居处也”。俨然为那一代人师在抗战艰苦岁月安贫乐教之真切写照，我本人在少年时代就从他们的身教汲取了终身受用不尽的精神营养。

作者从教育哲学层面论述思索，给我印象较深的是治学风格的通达。通即会通，达为豁达，如此才能形成恢阔的气象。譬如多少世代哲人穷究苦思的“一多问题”，即一元论与多元论的分歧，作者并未偏执一端，而是从“推究其所以然”的源头，分析歧义产生的原因。作者从“人群组织”（政治体制之一多）谈到真理之一多。讲义提示：“又如所谓真理者，果独一无二乎？抑为数非一可并存而不悖乎？使真理而果独一无二者，则有权要求独尊，而排除其他自号真理者。思想专制，缘是而获得其理由。使真理而非独一者，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人我之间，将无共同规范之可循。思想界陷于无政府状态，而多元论有其不可成立之当然。此又实际问题使人不得不考量真理之为一为多也。”老师只提出问题，只提出分歧之所以产生，以及思考问题的理路，并非简单提出或暗示自己的结论。这才是真正的启发式教学，而与旁征博引以自炫的满堂灌大异其情趣。我想余教授的课堂内外，必定会引发生动活泼的讨论，还有那无穷尽的个人思索。

回想起来，1941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加强党化教育，重庆地区的学校受控更为严格。家菊先生在课堂上公开反对“思想专制”的“恶性教育”，这需要多大的学术勇气。他虽然参与青年党活动，但是在思想上仍然与曾琦、李璜之流政客有所区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始终追求学术思想自由。他认为哲学思索有一特点，“即其思索活动之无边性是也”。讲义中有许多精彩议论如：“哲学的思索无远弗届，无微弗入，彼实无有界域。此其原因，乃由于哲学思索之横扩性。”“科学之终点，正是哲学之起点；哲学所终，在无可涉思处。故曰哲学的思想为究竟的思想。以究竟一义，区别科学与哲学，本无不可。惟察究竟所由起，实仍起于思索之横扩活动。科学思索自限于一定的封域，故可恪守其最高

之假设。哲学思索横扩无止，每一假设，必思其反；反无可反，斯乃扩无可扩也。有新境可扩，则旧假设必有可反；假设本只适用于原有封域之内；境界既扩，旧假设即不可贸然适用于新境地，更不可贸然用为新旧境地之统一说明。境地开扩一次，旧假设即须修正一次。如何修正？曰：思其反而是已。不思其反，一认为是，将何有修正之可能？反而又反，达于究竟；是即扩而又扩，以达于无垠。无上即无边，横扩即思反，状其进展，则曰横扩；状其动态，则曰思反。果思其反，夫何无上无边之不可及哉？”“无上”乃自主，“无边”乃无禁区，唯思索空间的无限，才有真正哲学中的自由与创新。这不仅是一种学理，也是一种信仰与追求，其中还包括作者自己在“横扩”思索中的体验与感悟。能够聆听这样的课堂教学，想必能获得如同醍醐灌顶一般的享受。

讲义体大思精，精彩之处难以逐一缕述，因为作者探讨的范围已经超越课程本身。通常认为，教育哲学乃是从哲学角度探究人类学习活动的规律，并以此指导教育实践的一门课程。一般教育哲学家也多半着眼于“符号探索”、“学习动机”、“学习能量”、“学习复活”、“才智、情感、体力、意志一体”等比较具体的层面与视角立论。但家菊先生的讲义内容则颇多涉及哲学主体的终极与人生价值的深层感悟，真所谓“无远无届，无微不至”，对读者有更多也更为真切的启发。因此，我为此书能在母校出版庆幸，希望有更多的教育工作者认真阅读家菊先生的佳著并汲取教益。

遵传韬兄面嘱，谨书以上浅见，聊以充序。

章开沅

公元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日

梁 序

本书作者余家菊先生乃我六十年前就读南京中央大学附中高中时之同班学长余传韬兄之尊翁。家菊先生国学淹博，服膺孔孟思想，道德文章夙为世人钦仰。我生也晚，未曾有机缘拜见家菊先生，亲聆教益。今岁春腊，传韬兄告知将为其先君举办学术纪念研讨会，并将在遗稿中所发现之抗日战争时在大学授课之《教育哲学》讲义一卷付印，发给与会学者，以为纪念与参考。又谓此稿从未刊行问世，此次成书已是作者当年写稿一甲子之后，世代更迭，潮流变迁，要我写一序言以为引介说明。我为家菊先生之晚辈，学植浅陋，岂能担此重任，惟坚辞不获，于拜读家菊先生遗稿之后，只能以读书心得方式作一报告，不敢言序也。

研究教育哲学多以讨论教育之本质为主要范畴，本书亦不例外。本书内容共分五章，凡教育之理论基础，追求目标，意志动力及思维方法等均所涉及。其论证说明则一以四书经传为依据，糅以近代社会学与心理学理论，自成体系。全书用文言文写成，文字典雅优美，足见旧时代宿儒风范。我能先睹为快，受益良多，归纳言之，有下列五点：

一、作者以教育之本质为爱，教育活动乃出于对他人之爱心。此一爱心始见于父母对子女，教育事业则是推爱之结果。爱之最高境界为真善美圣，故教育为一提撕向上之进程。作者秉持孟子性善论点，肯定人性向上，故教育有其可能性。惟人性向上，其强度各有不同，教育之功能即在使受教者立志，增强其向上之决心。

二、受教者产生向上之决心后，尚需有存养功夫，使之持久不衰，以臻于完美之境。此一存养功夫乃以“知止”为其关键。所谓“知止”是指人的一切

行为举措，均应恰如其分，不可陨越，如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等。作者以为“知止”之教，开始以信仰为主导，教师为学生信仰对象之一，故教师必须慎重其教。但作者认为信仰并非不可怀疑，若信仰与知识冲突，则应改变信仰。此一论点足见作者虽博淹旧学，笃信传统文化，但并不故步自封，在学术上表现其开明态度。

三、教育究应以言教或境教为重？学习究系一交替反射之过程或对问题了解之过程？学者每有争论。作者以“思索为解除疑虑、克服阻力之要道”，似偏重对问题之了解，重视言教。但作者所谓之思索是指受教者个人之思索活动，讲求对问题的“正”、“反”两面之思考，即作者所谓之“横扩思考”，其意义又超乎言教。所谓“横扩思考”其实即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 W. F. Hegel）提出的辩证法的思考方式，有助于对问题之了解与解决。除主张“横扩思考”外，作者并重视实际经验，认为研究教育问题者“须从事实教育工作，理论不离实际”。此一观点似又与西方之经验主义与实验主义相近。其实学习活动乃一复杂的行为，由简入繁，视学习的对象与内容而定，也与学习者的年龄与智能有关。因此，教育的方法也不限一端。本书立论虽以孔孟思想为基础，但已融入近代西方的教育概念。

四、人性论为研究教育哲学者所不可或缺之一项课题。人性是善或恶，关系教育之本质与取向甚大，历史上不但教育家，甚至哲学家均多所讨论，有不同的看法与主张。本书作者以孟子性善为宗，融摄近代学术研究结果，认为人之“天性为纯善，恶之发生乃由活动失去和谐之调节”。此说不但有其创意，对教育之方法取向也具有参考价值。

五、作者对教育目的之看法，可从其“人格之发育”一章窥见。作者以为人格之发展有三个阶段，依序为重利（物质我）、重名（社会我）、重义（精神我）。教育之目的即在提撕人性，使之能达到重义之最高阶段。人格的发展一如一个人成长，需要有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但最终则须进入道德价值的境界，以为二者的统摄。这就是精神我的自我实现。近代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 H. Maslow）也曾提出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一观念，但马斯洛对自我实现的想法包括人生各方面，非如作者仅指之道德层面。道德层面以外之自

我实现，应是如作者所引之中庸二十三“其次致曲，曲能有诚……”，则也可有其成就。作者强调道德之自我实现，乃在于人应尽其善之本性，只需存养有道，则人人皆可做到。就此一观点言，其格调实较马斯洛为高。人文之发展与进步，必须以此为基础，否则仍难免有所缺陷。

综而言之，本书之作，以孔孟思想诠释教育之本质与功能，精辟透彻，在教育哲学一领域足可称为一家之言，令人敬佩。本书为篇幅有限，未能多提西方教育哲学学者之论点，作比较研究，可能是美中不足，但作者以传统思想阐述教育哲理，发扬中华文化精神，贡献甚巨。尤其本书在今日一片去中国化声浪中，重新拾读，可谓空谷足音，更别具意义与价值。

本书作者哲嗣余传韬兄为纪念其尊翁，举办学术研讨会并印发此书，孝思不匮，令人感佩。我遵嘱于拜读此书后提出读书报告，谨缀数言，尚祈传韬兄与诸位学者专家不吝指正是幸。

梁尚勇谨识

公元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五日